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Review

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评论

——第2辑——

主编 吴彦 黄涛

国家、战争与现代秩序

——卡尔·施米特专辑

合法性问题 [德]施米特

施米特1930—1934年日记 [德]施米特

评施米特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德]基希海默尔

自主性的恐怖：英语世界中的卡尔·施米特 [德]哈贝马斯

凯尔森与施米特 [德]鲍尔森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Review

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评论

第2辑

主编 吴彦 黄涛

国家、战争与现代秩序

——卡尔·施米特专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战争与现代秩序·卡尔·施米特专辑 / 吴彦、黄涛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评论·第2辑)

ISBN 978-7-5675-6022-2

I. ①国… II. ①吴… ②黄… III. ①施米特(Schmitt, Carl 1888-1985)-法学-思想评论

IV. ①D9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2818 号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评论·第2辑

国家、战争与现代秩序

编 者 吴 彦 黄 涛

责任编辑 彭文曼 陈哲泓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插 页 1

印 张 9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 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022-2/D.209

定 价 60.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编委会

主 编 吴 彦 黄 涛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浩 王 涛 王江涛 田飞龙 冯 威
朱 振 朱明哲 刘振宇 汤沛丰 李 柯
李明坤 李燕涛 杨 陈 杨天江 汪 雄
张 巍 周国兴 郑 琪 郑玉双 赵 真
姚 远 徐震宇 蒋如俊 韩 毅 雷 磊

卷 首 语

理解和把握我们自身的现实处境往往是我们得以展开进一步行动的前提。这一现实处境在某些方面是历史性地形成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是当下涌现出来的。我们往往用“现代”(modern)这一既表征“时间”又表征“特性”的概念来刻画这一普遍处境。在时间上，它将它自身区别于“传统”与“古代”，并以一种“进步的历史观”来替代一种“退化的历史观”，从而，“未知的未来”成为我们竭力去追求的目标，“远去的过去”这个原本被模仿和追求的对象现在被倒转过来成为一个被我们看成是已经历过且已被我们克服和超越的东西。在特性上，它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实现了一种对于传统的普遍批判。首先是对于整个世界秩序的看法，那个有着共同目的的一体性的宇宙被分割成两个不同的领域：人事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原本被看成是遵循自然秩序的人事，现在以某种激进的方式被独立出来，它不再把自己看成是自然而然的，相反，它把自己看成是一种通过其自身的意志而被创造出来的独立的秩序，这既包括法律和政治，亦包括道德。

由此，这一与“自然”的脱离，实现了道德、政治和法律领域的全面的革新。首先，道德的重心开始从“德性”往“自由”转移：道德的核心不再被看成是对于自然性情的塑造[德性]，而被看成是

一种通过其自身而实现的对于其自身的塑造,由此,自由这样一种自我建构的能力便被凸显出来而作为道德的核心要素予以讨论。自由的凸显赋予个人以某种脱离自然这一统一体的独立性,并进而生发出政治和法律领域的革新。自由、个人以及独立性的凸显,将原本那个被“自然目的”所统合起来的世界以某种原子式的方式彻底地碎片化。一方面,目的不再被看成是一种“共同”的“内在于”人自身的目的,而是被看成是“个人”的目的,只属于某个单个的个体。由此,原本立足于自然目的的道德的普遍性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抛弃,从而,人们或是去其他地方寻找这种普遍性,或是索性以某种相对主义来替代它。另一方面,伴随普遍道德之崩溃的是个体间冲突的凸显,既然道德无法保证这种统一性,那么就只能诉诸道德之外的力量,此时,政治这一原本被道德所吸纳和被归属于其下的力量便分裂出来以作为这种外在的力量来应对这一危机。由此,政治不再去诉求“善”(good)这一极富道德意涵的概念来作为它的目的,而是将之代之以旨在消除冲突和战争的“和平”。作为政治的一个附属品,法也不再像以前那些把它自己理解为是为了促成某种共同善[如阿奎那对于法的定义那样],而是把它自己理解为是为了保障某种和平关系,也就是说,它不再关心人的内心秩序,而仅只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外在的和平关系。所有这些对于道德、政治和法律的理解构成了我们现在所置身的这一现代秩序的核心,在其中,个体、战争、和平与国家等概念既构成了我们理解现代秩序的基本框架,也形塑着我们的现实处境。

80年代之后的中国以及中国的思想界以某种近乎激进的方式接受了这一现代秩序的基本理解,并遵循着这一秩序的基本逻辑而进行着某种自我的形塑,由此,在这一形塑的过程中也展现出某些由这一逻辑所必然带有的固有弊病。自由和权利被当然地理解为是一种可做任何属于自由和权利范围之内的事情的权力,道德的个体化则削弱了普遍的道德感,并进而生发出怀疑主义和相

对主义,责任和义务的意识在这一基本的氛围之下逐渐被弱化和祛除,由此而使人的生活渐渐为娱乐所取代,缺乏严肃的东西,没有应必须予以履行的东西,一切都只不过是利益的一种交易而已。这一基本的道德境况进而扩散到政治和法律领域。替代这种虚无主义的是一种以强力为基础的法律观,法律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而是国家制定的产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具有与之相类似的约束力,并且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国家所制定的不是它自身所认为属于其自身的东西,而是那个应予以模仿且有着理想色彩的西方的法律体系。由此,这两种原本看起来近乎对立的要素糅杂在一起。这一强烈的有着固定内容的实证主义立场支配着 80 年代之后整个民族的基本法律意识。

施米特的传入,正是在这样一个基本背景之下,而其所引发的论争和挑起的激情也正赖于对抗上面所描述的这一基本的道德、政治和法律境况。对于“战争”和“区分敌友”的强调,让人联想到一种不同于娱乐的“严肃性”和“男人的英雄气概”,对于“决断”和“例外状态”的强调,则试图攻击那个被原本糅杂在一起的东西,将之区分开来并一一予以击破。我们在法律的体系之外看到了一股强大的塑造力量,“人民”和“领袖”的概念被激发出来并散发出强大的解释力和现实感。对施米特的关注乃至入迷,正赖于他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时代一些被压抑、被忽视乃至原本被祛除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正好可作为对抗现实和反思现实的力量。研读和思考施米特的理论,也正是在这一基本背景之下才具有其正当性和某种现实的迫切性。

本辑所讨论的话题聚焦于施米特的宪法及政治哲学。自施米特的思想被引入中国之后,其首先被关注和被予以讨论的是他的政治神学。但是,施米特首先是作为一名宪法学家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与凯尔森、黑勒、斯门德等一起被誉为魏玛时期最重要的宪法学家,这几个人的观念相互之间亦有纷争。他们之间的

这些争论为后世人们研究那段历史,以及研究宪法理论和政治理论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源。本辑所录之内容并不聚焦于国内比较流行的从政治哲学乃至政治神学的视角来审读施米特,而是试图从法学,尤其是宪法和国家理论的角度来考察施米特,将其置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尤其是争论语境之中。本辑收录了黑勒、基希海默尔、哈贝马斯等著名学者对于施米特的评论,以及著名的凯尔森学者鲍尔森撰写的施米特与凯尔森之间有关宪法问题的那场著名争论,同时亦有施米特本人的日记。从这些资料中,国内学人大致可以看到一个“法学视角”下的施米特。

目 录

卷首语 / 1

主题论文

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克劳塞维茨：评论与提示 [德]施米特 著
李柯 译 / 3

附录一：信念备忘录第一部分 [德]克劳塞维茨 著 李柯
译 / 35

附录二：给费希特的信(1809) [德]克劳塞维茨 著 黄涛
译 / 4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秩序(1962) [德]施米特 著 李柯
译 / 50

合法性问题(1958) [德]施米特 著 邹益民 译 / 77

施米特 1930—1934 年日记(选译) [德]施米特 著 温玉伟
译 / 84

评论

评施米特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德]基希海默尔 著 黄涛

译 / 127

自主性的恐怖：英语世界中的卡尔·施米特 [德]哈贝马斯 著
杨帆 译 / 167

凯尔森与施米特：从分歧到 1931 年“守护者”之争的决裂 [美]
鲍尔森 著 张龑 译 / 181

政治民主与社会同质性 [德]黑勒 著 郑琪 译 / 232
神学与政治理论 [德]陶伯斯 著 温玉伟 译 / 245

资料

德语学界施米特文献辑录 韩毅 整理 / 259

英语学界施米特文献辑录 郑琪 整理 / 268

稿约和体例 / 275

主 题 论 文

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克劳塞维茨： 评论与提示^{*}

[德]施米特(Carl Schmitt)著

李柯^{**}译

[编者按]施米特的政治法学的研究中,有关战争法的研究是其重要部分,在著名的《政治的概念》中,有一章专门处理有关战争的论题,甚至可以说,战争成为支撑施米特政治概念及其法学的一个重要支柱,对于敌友的决断必然会导致有关战争法权的问题。

在施米特有关战争的研究中,克劳塞维茨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却长期被人忽视的主题。施米特对于克劳塞维茨的关注前

-
- * 1. Carl von Clausewitz,《著述、论文和通信:辑录自克劳塞维茨、香霍斯特和格奈森瑙遗稿以及公共和私人收藏》(Schriften-Aufsätze-Briefe. Dokumente aus dem Clausewitz-Scharnhorst- und Gneisenau-Nachlaß sowie aus öffentlichen und privaten Sammlungen), hrsg. von Werner Halweg. Mit einem Vorwort von Karl Dietrich Erdmann, Band 1. Göttingen, 1966, Vandenhoeck & Ruprecht, 768S., DM 135.-
 - 2. (关于第二节和第三节) Rainer Wohlfeil,《西班牙和德意志起义》(Spanien und die deutsche Erhebung), Wiesbaden 1965, Steiner.
 - 3. (关于第四节到第六节) Julien Freund,《政治性的本质》("L'Essence du Politique"), Philosophie Politique, Collection dirigée par Raymond Polin, Nr. 1, Paris, 1965, Ed. Sirey.
 - 4. (关于第五节和第六节) Bernard Willms,《总体自由:费希特的政治哲学》("Die totale Freiheit, Fichtes politische Philosophie"), Bd. 10 von Staat und Politik, hrsg. von Ernst Fraenkel, Otto Heinrich von der Gablentz, Karl Dietrich Bracher. Köln und Opladen 1967, Westdeutscher Verlag.
- ** 李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洪堡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

后长达 30 余年，在 1932 年版的《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对于经常被引用的，而且在他看来是不恰当地引用的“战争不过是政治交往借助于其他手段的延续”这句名言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在施米特看来，作为职业军人的克劳塞维茨看到了战争中包含的政治决断。但很显然，克劳塞维茨并非支撑《政治的概念》的核心论点的核心作家之一。30 年后，在 1963 年出版的《游击队理论》中，克劳塞维茨自始至终成为了一个核心人物，克劳塞维茨的上述名言，被发展为“已经简要地包含着一种游击队理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成为 1813 年以来游击队实践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从此，游击队在哲学上获得了揭示与尊重。

在 1963 年的《游击队理论》中，克劳塞维茨成为了一位尽管在官职上地位卑下，但却在思想上最为辉煌的人物，并且指引着后来的伟大政治家，克劳塞维茨被视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萨兰这些显赫的政治人物的游击队理论与实践的先驱者。但此时，克劳塞维茨仍然是作为职业的军事作家而被提及，尽管《游击队理论》的一开头就说，游击战拓开了新的战争空间，发展出了新的作战概念，产生了新的战争学说和政治学说，进一步而言，游击战的出现意味着古典国家学说的终结，意味着区分敌友、强调敌对的相对性的古典战争法的终结。

然而，施米特对于克劳塞维茨的兴趣并没有因《游击队理论》中的大篇幅处理划上句号，四年后（1967），施米特在《国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克劳塞维茨：评论与提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克劳塞维茨不再仅仅是作为游击队理论的先驱者，不再仅仅是作为军事哲学家，而是作为政治思想家出现在世人面前，克劳塞维茨的形象更为丰满。这篇文章极大地深化和展开了《游击队理论》中仅仅简要提及的克劳塞维茨写于 1812 年 2 月的《信念备忘录》和他同费希特的书信来往，借此言说人民战争的实践和德意志人对于法国人的敌意，对于敌人或者敌对性的关注

成为《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克劳塞维茨》一文的核心命题(值得注意的是,1812年的《信念备忘录》曾被民族主义者和后来的纳粹党人希特勒所利用,当希特勒提到克劳塞维茨时,指的就是写作《信念备忘录》的克劳塞维茨,而不是写作《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对于这个话题的关注又恰如其分地同有关民主正当性——王朝正当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从而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说的意义置于民主正当性时代对于敌友区分的学说的体系之内,在这里,克劳塞维茨被描述成奉行《政治的概念》中有关敌友区分的学说的典型代表。

1970年代初期,法国当代政治思想家雷蒙·阿隆对于克劳塞维茨展开集中研究,并最终撰写出版了两卷本的《思考战争:克劳塞维茨传》(阿隆有关这段研究经历的自我叙事,参见《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杨祖功等译,新星出版社,2006,第552—573页,其成果最终体现在其中)。施米特和阿隆的克劳塞维茨研究,极大地超出了作为军事哲学家和军制改革家的克劳塞维茨形象,与有关国际法、国际关系和现代国家的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拓展了作为军事哲学家的克劳塞维茨及其代表性著作《战争论》的意义。将两者的克劳塞维茨研究加以对照,是非常有意思的思想史命题,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都涉及到对于20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理解,都处理过有关热核时代的战争与政治观念。

汉语学界译介克劳塞维茨已逾百年(1911年曾出现过题为《大战学理》的中译本),但迄今为止,研究者多是从军事哲学或者是战略学的角度阐发其价值。之所以译介《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克劳塞维茨》一文,在于呈现一个更丰富和更完整的克劳塞维茨形象。为了理解便利,文末翻译了两个附录,分别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念备忘录的第一部分(附录一)和克劳塞维茨给费希特的书信(附录二)。

一、哈尔维克版的克劳塞维茨文集

如今提到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名字时,已不需要太多解释。它唤起的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位能干副官的形象:在天才上级香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森瑙(Gneisenau)的光环下参与了普鲁士军制改革,后来写了一本爆得大名的《战争论》(*Vom Kriege*)。

今天,他的名字人尽皆知。世界革命家如列宁(Lenin)和毛泽东,把他纳入了世界历史的宏大语境。甚至在讨论核武时代的兵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候,他仍然葆有生命力;确切地讲,若抛开那些受制于时代的言说内容,他的战争理论与其说在技术上陈旧了,不如说今天已然变得现代,也已成为检验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测试典范。只有站在这个伟大名字所开启的视野内,人们才能完全公正地评价哈尔维克(Werner Hahlweg)编纂克劳塞维茨文献的杰出成就。

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版本上的成就,并不意味着说,要把编者归为单纯的文献甄选人和历史的记录者。哈尔维克令人印象深刻的整体表现恰恰以文本研究和历史问题意识之间的出色关联为基础。哈尔维克不仅希望还原一个个性特征鲜明的克劳塞维茨,更希望勾勒“完整的”克劳塞维茨形象。编者的这种能力,不论是通过编辑出版《战争论》(Ferdinand Dümmler in Bonn, 1952)一书、写作题为《列宁和克劳塞维茨》(“Lenin und Clausewitz”)的开创性论文(《文化史辑刊》, *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Bd. 36, 1954),还是通过发表《普鲁士的改革年代和革命战争》(“Preußische Reformzeit und revolutionärer Krieg”, 载《国防科学评论》第18卷副刊, *Beiheft 18 der Wehrwissenschaftlichen Rundschau*, 1962),都早已得到证明。

要获得完整版的克劳塞维茨——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和士兵的合一又清楚的总体形象，当然唯有借助无数近代史材料的形构和塑造。这时，文献编排的时间顺序只能算作辅助工具和迈出的第一步而已。纯粹的编年体例，再加上书籍装订技术上无可避免的麻烦，让这部文献汇编在 1812 年这个决定性的年份上出现了一次停顿，因为重要的 1812 年 2 月《信念备忘录》(*Bekenntnisdenkschrift*)就收录在我们面前的第一卷当中，但它其实和收录在后面第二卷里面的一些文献直接相关，不可分离。这并不是非难实践上几乎无法绕过的编年秩序，而更多地是针对我们时下对第一卷所做的那些说明。或许可兹回应的是，这两卷文献都充溢着同样的热情，即对克劳塞维茨的赞美。基于此，我们眼下这些带着适当的慎重所作的评论和提示，才将获允许，才会有意义。

克劳塞维茨是位政治思想家。唯有作为思想家而不是将军、部队首长、政治人物或外交官，他才可以和他的上司、老师兼朋友格奈森瑙的卓越形象相提并论。这对朋友的合作值得赞赏。那些关于谁在某方面更具优势的争论问题，都会因此而完全无关紧要。哈尔维克写下并强调这句话：“在格奈森瑙身后站着克劳塞维茨”（页 44）。《战争论》这本书也必须被理解为一份与格奈森瑙的持续而又丰富的思想交流。

按照确定文献顺序的编年秩序，呈在我们面前的第一卷基本上涵盖 1807 年到 1812 年间的普鲁士改革时期。全编由 1803 年到 1805 年的两个短篇起头，跟随其后的是“崇高年代伟大信念录的序章”（罗特菲尔斯[Hans Rothfels]），也即写于 1807 年 11 月至 1808 年 3 月间的备忘录(*Denkschrift*)《论普鲁士将来对法兰西的战争运作》（“Über die künftigen Kriegsoperationen Preußens gegen Frankreich”）。罗特菲尔斯已在 1919 年出版过这份备忘录，现在，哈尔维克根据克劳塞维茨自己的手写笔记原件又将其再版。接下来是 1809 年 12 月到 1812 年 3 月间与香霍斯特将军的公务书札